

# 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董强 雷惠玲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庄严宣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抗战精神铸就了不屈不挠的凝聚力。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从东北抗联的冰天雪地到八路军的敌后战场,从淞沪会战的硝烟弥漫到百团大战的英勇无畏,无数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以爱国之心铸就民族之魂,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无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与抗战,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这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其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紧紧相连,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要继续增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伟大抗战精神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的领导力,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伟大抗战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最早宣传动员者和组织实施者,更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实施,为全民抗战指明了正确方向,对抗战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在敌后战场,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更在精神上激励了全体中华儿女,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取得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伟大抗战精神彰显出坚毅顽强的生命力。烽火岁月,无数中华儿女以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巍峨丰碑。“我以我血荐轩辕”,抗日志士不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

全胜利。这种气节,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坚强脊梁,正是因为有这种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绝。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挑战,但每一次都能在苦难中奋起,在挫折中前行。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源自中华民族对正义的坚守,对和平的向往,对未来的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

伟大抗战精神激发起勇往直前的战斗力。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从平型关大捷到台儿庄战役,从百团大战到长沙保卫战,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这种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的精神支柱,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抗战精神激发的勇往直前的战斗力,是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伟力。他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投入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伟大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发展特色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在生态保护的前沿阵地,各族群众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护着祖国的绿水青山,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生态家园。敢于斗争,善于创造,中国人民将锲而不舍奋斗在新征程上,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锻造出百折不挠的持久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秉持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

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回顾14年的战斗历程,正是对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坚持、敌后游击战的灵活运用、国际战场的艰苦周旋和国内各条战线的顽强坚守,中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最终赢得了这场正义之战的胜利。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起的力量源泉,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面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需要我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克服。各族人民秉持这种精神,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教育医疗改善,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传承……以“滴水穿石”的毅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共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

伟大抗战精神凝聚成命运与共的感召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全体中华儿女命运与共、团结一心的结果。伟大抗战精神,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凝聚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磅礴合力,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一定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不朽丰碑,是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重要动力。从不屈不挠的凝聚力到坚毅顽强的生命力,从勇往直前的战斗力到百折不挠的持久力,再到命运与共的感召力,这些精神财富跨越时空,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其融入每一项工作中,体现在每一次奋斗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分别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

□李少鹏 杨昌儒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深邃历史眼光、宏大国际视野和未来战略思考,深刻阐述了这场战争胜利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关键。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和战略枢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各民族力量、支援全国抗战,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 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地领导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我们的国家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更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贵州,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建设,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赢得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的贵州地方党组织成立后,成为团结带领贵州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并积极发动贵州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不断地加强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动员各族群众参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障战时物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12月后,中央红军及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进入贵州,组织了红军遵绥游击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革命武装,建设了“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其中,中共赤化特支组织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声援东北义勇军,唤醒和激发了贵州各族人民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贵州先后建立了中共黔东工委、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的地方组织,使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得到了广泛宣传,动员了各族青年入伍北上抗日,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占领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林青关于贵州地下党的组织情况汇报。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委,林青任书记,成为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贵州省委建立后,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活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组织地方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成为贵州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领导者。“卢沟桥事变”后,中共贵州省委重新组建,贵州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逐渐扩大,有力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在党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全省各族人民的坚强力量,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显著激发与呈现。

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

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贵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使命,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工作的感召力和感召力,逐渐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意志和行动熔铸一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激发了蕴藏在各族人民之中的无穷伟力,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组织动员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1938年5月,在中共贵州省委的安排下,中共党员邵公文利用庆祝书店开业的机会,成立统一战线组织——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由中共党员王启霖、何战白、蒋嵩如组成小组领导座谈会的活动,重点座谈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理解。在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贵州地区党组织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顽固妥协和分裂、倒退的斗争中,团结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等,争取了各种地方中间势力,国民党贵州当局迫于抗日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贵州各族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汇聚的抗战大后方。1939年1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成立,形成我们党连接延安与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红色枢纽,凝聚起一股重要的抗日救亡力量。在血与火中,交通站护送了大量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国际友人往返于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军士、知识分子、工人等与贵州各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在军工生产、难民救助、文化交流等共同实践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场域,谱写了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壮歌,对推动贵州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抗战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形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辉煌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州各族群众积极开展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目标的广泛宣传动员。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抗战宣传,不仅唤醒了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更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贵州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共赴国难,通过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文化宣传等形式切实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中,中共贵州省委积极影响、团结、引导文化文艺教育界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民,开展一系列文化抗战活动。依托《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以及“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等阵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主张;在贵阳、遵义等地创办《贵州日报·抗战增刊》《烽火》等刊物,用多种民族语言宣传抗战,使“抗日口号、保卫中华”理念深入人心;“沙驼话剧社”上演《放下你的鞭子》,揭露日军罪行、唤醒民众觉悟;“筑光音乐会”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与浙大“黑白文艺社”开展的诗歌朗诵激扬士气,将保卫家园、保卫祖国、保卫中华的呐喊化作精神号角;大夏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大夏歌咏队”,以激昂的旋律唱响抗日救亡之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抗战时期遍及贵州全省的全民族抗战运动说明,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紧急关头,贵州各族群众都在为抗战贡献力量,甚至不惜牺牲。这一时期贵州各族人民的贡献,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资源。

【作者分别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本文系贵州省民族宗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新时代民族学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阶段性成果。】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至今,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已逐步实现从单向度“帮扶”到双向互益“协作”的历史性转轨。近年来,随着粤黔明确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结对帮扶关系,两省遵循互利共赢的基本方针,产业协作策略更加关注以往协作成果的“存量优化”与“效能提升”,切实规避帮扶资源沉淀化与项目不可持续性的风险。当前,贵州正积极行动,努力盘活脱贫攻坚时期积累的产业协作资源与形成的帮扶资产,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蓄能。广州市黄埔区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聚鑫肉鸭产业,立足既有基础,致力于持续提升协作资源的配置效率,使东西部协作产业“家底”在新环境下焕发勃勃生机。

## 精配协作资源 筑牢产业基础

九年前,在广州市越秀区与黔南州长顺县东西部扶贫协作支持下,贵阳市知名企业但家食品有限公司落户长顺县白云山镇,初步构建起涵盖肉鸭养殖、加工、销售的基本产业体系,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出一定积极作用。随着时间轴延伸及外部环境改变,该产业逐步暴露出养殖基地散弱、标准化程度低、加工设备老旧产能不足、销售渠道狭窄、联农带农效应不足等诸多问题。对此,广州市接棒越秀区的黄埔区与长顺县开展东西部协作(以下简称“埔顺协作”)敏锐洞察,珍视拓展协作基础,坚持“投一处、成一处、带一片”的精准治理原则,制定“专项投入+持续跟进”的财政协同机制等并持续发力。在资源配置层面,协作重点突出显著的结构性与靶向性特征。一方面,聚焦于养殖环节的现代化改造。2022年投入760万元协作资金用于建设标准化养殖大棚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使肉鸭存栏量从10万羽提升至30万羽,不仅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更力求通过技术嵌入提升生产要素效率。另一方面,着眼于加工环节的链条延伸。2023年投入900万元在但家食品产业园内建成4200平方米厂房,2025年再投入协作资金850万元,在产业园内建设香酥鸭肉制品专用加工流水线一条,通过东西部协作撬动其他资金投入,目前园区内已配备自动化屠宰线、熟食加工车间及冷链仓储系统,构建集研发、加工、储运、销售于一体的产业运营体系,使日屠宰能力从1万只增至5.5万只,熟食加工产能从1.3万只提升至8.2万只,既有效破解“产加脱节”的结构性困境,又推动政策资源在关键节点投放的边际效益实现最大化。在制度建构层面,突出落实“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快从外部赋能向内生发展的制度性转化步伐。具体包括采用贷款贴息、设备确权分红等政策工具,在降低企业与农户初始投入风险的同时,通过产权界定和利益联结机制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从制度层面保障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包容性。

## 多端有序发力 增强产业韧性

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价值创造的关键枢纽,主导着农业产业链的形态演进与能级提升。“埔顺协作”围绕“广州所能”,系统制定以但家食品为核心载体的产业赋能策略,并从养殖、加工、营销等多个端口着力,持续锻造产业链韧性,推动价值空间拓展。在养殖环节,重点支持产业实现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代养的转型。具体以推广“离地早养”为要点,创新从鸭苗、食料药品到技术、收购等“四统一”代养模式,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风险,使养殖发病率下降30%、成本节约15%。目前,长顺县已建成11个标准化养殖基地,覆盖2个乡镇,并发展家庭农场15户,预计至2027年可培育代养户235户,年出栏肉鸭规模可达1500万羽。在加工环节,产业依托协作资源成功引入系列先进加工设备,持续提升加工水平。屠宰车间的自动化流水线能完成宰杀、脱毛、内脏清理等工作,卫生标准达到省级食品加工要求。熟食车间已开发出香酥鸭、茶香鸭、川娃酱板鸭等10余种产品,并获评“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制作技艺”。此外,还在积极探索实施鸭绒加工等副业高价值路径,预计年附加值超5000万元。在营销环节,产业借助广州市场与品牌资源,成功构建“线下全国布局+线上平台对接”的双轮体系。已在全国布局600余家直营店和加盟店(其中省外220家),入驻盒马鲜生等电商平台,打入长三角、大湾区高端市场,2024年省外销售占比提升至35%。同时,品牌建设也成效显著,2024年,“但家香酥鸭”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成为贵州首个获此殊荣的鸭制品品牌。同年,产品抽检合格率达100%,获评“省级禽肉(蛋)重点民生保供企业”。目前,其品牌价值评估达5亿元。此外,冷链物流中心也在规划建设中,产业链闭环正得到进一步完善。

## 拧紧利益纽带 确保农民增收

“埔顺协作”始终关注产业的“联农带农”效应,并通过引导构建多层次、制度化的利益联结体系,采用政策赋能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系统降低农户参与门槛与发展风险。从而有效将农户嵌入现代化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巩固拓展协作成果:一是抓实就业稳岗提升工资性收益。支持但家食品有限公司针对周边易地搬迁户设立就业帮扶车间,提供岗位250余个。运用“包容性价值链”建设思路,积极将低收入群体纳入就业体系,既提高农户的收入稳定性,又促进传统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预计五年内新增3000个就业岗位,将进一步完善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结构,形成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二是抓实代养合作拓展经营性收益,创新推出“政府补一点、企业垫一点、农户贷一点”的代养合作模式,对此,长顺县相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肉鸭养殖贷款贴息方案》,形成政府通过信用降低融资成本,但家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垫付生产资料以及提供全程服务降低准入门槛,农户顺利获得启动资金以及专业化养殖支持而积极参与的良好态势。按当前效益测算,代养户年均收益可达14.58万元,这一收入水平不仅远高于传统农业经营,更显著增强了农户应对市场的能力。三是抓实村集体共建“增收财产性收益,通过建立“企业+村集体+农户”三者有效利益联结机制,明确将协作资金投入的养殖设备、加工设施确权至村集体,并牵头与但家食品有限公司约定基准收益,通过推动村集体及农户分红、资产收益等形式落地,持续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群体受益面。仅2024年,已实现分红资金27.36万元,惠及三个搬迁安置点的380户脱贫户及“三类”重点人群。设备确权分红的成功施行,既有效缓解产业初期投入压力,也为长效收益分配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得益于“埔顺协作”行之有效的政策衔接与资产活化治理创新,今天的长顺县肉鸭产业已实现“量质齐飞”,形成颇具规模及影响的亿元级产业链,成功占据贵州省鲜品市场较大份额,同时还以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100%的成效,顺利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这种兼具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包容的产业协作模式,为新时代东西部产业协作贡献出有价值的实践样本。

【作者单位分别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长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阶段粤黔东西部协作空间拓展》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LL2401)。】

——以长顺县肉鸭产业发展为例  
□韩缙 陈莎莎

# 深化粤黔协作的内在要求与实现途径